

● 王 舜

# 网络环境下议题属性显要性的“曲线变革”

——以2012年两会浙江代表团“旗袍秀”事件为例

在网络环境下，议题属性显要性并不总是由媒介决定，议题属性议程设置成为一个非闭合的流程。本文尝试以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浙江代表团“旗袍秀”事件为例，探析网络环境下议题属性显要性转移的路线，并以此观照个体、社群、媒介、公众、政策等之间的议题属性议程设置新特点。

## 浙江代表团“旗袍秀”事件与议程设置

1. 第一阶段：议题的媒介显要性获得和转移及属性显要性设置

2012年2月29日，浙江在线刊登了一篇题为《百年华装看旗袍 丝博中国旗袍百年展3月晋京展出》的文章，文末透露：3月5日，两会浙江女代表委员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入口处上演真人旗袍秀，之后还将亮相《华装风姿——中国旗袍百年展》开幕式。

3月4日，即两会开幕前夕，一则《浙

江女代表委员将身着高级定制旗袍亮相大会堂》的报道见于《钱江晚报》，主要信息与上述相同。

因浙江在线的报道，浙江代表团“旗袍秀”事件获得媒介议题显要性，进入了媒介议程，该报道文首处有“浙江在线·教育02月29日讯”字样，行文中对旗袍及相关设计者、设计作品极尽溢美之辞，看似新闻语言却又极具公关色彩。这一典型的地方媒体宣传性报道并没有获得舆论关注。

《钱江晚报》的二度报道因两会召开的特殊背景迅速被各大新闻媒体转载。3月4日，与此事件相关的日新闻报道量由2月29日的3篇迅速攀升至132篇。随着这一事件在媒介议题中显要性的增强，议题显要性开始从媒介议程向公众议程转移，舆论四起。

上述报道中，事件部分属性得到强调，如“令人期待”等，这为事件预设了语境，如果关于某个议题的媒介属性

议程是政治权力的体现，以上报道则多少折射出地方政府的意志和公关意图。

2. 第二阶段：议题属性显要性转变，个体、群体议程与媒介议程融合并影响政策议程

3月4日，浙江代表团“旗袍秀”事件顺利地实现了议题显要性从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的转移，并进行了属性显要性设置。然而，媒介议程的属性显要性并没有影响公众议程的属性显要性。该事件进入公众议程后，“令人期待”等特点并没有与公众产生共鸣；与此相反，“时装秀”、“谁埋单”、“奢侈”等属性获得公众关注，成为增强议题显要性的雄辩证据，个体或社群均以此为焦点，意见领袖也从以上各角度发表观点，构建出公众对这一事件的讨论框架。

相关调查显示，5成多网友反对女代表委员两会集体秀旗袍，超6成网友支持浙江叫停并建议严查。与网友观点相似，媒体评论也几乎倒向了反对“旗

子小时候就开始控制他们的上网时间，规范孩子的上网习惯，让他们养成自我管理时间的能力；努力培养孩子广泛的兴趣，避免让孩子为打发空虚的时间选择网络游戏作为娱乐项目。

第二，学校要做友善的引导者。很大一部分网络游戏成瘾者沉迷于游戏，是为了逃避学习给自己带来的压力，逃避老师的责备，寻求解脱。学校对于学生参与网络游戏的行为也不能全部排斥，应该看到网络游戏也存在正面德性；学校应开设专门的网络游戏或者网络德性规范的课程，提高学生的心理自控力和自我管制能力；学校应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，帮助学生尽快解决问题，走向健康的生活方式；学校应开展丰富多彩

的活动，为学生创造人际交往的机会；学校应加强对网络游戏成瘾的干预，科学引导，合理督促，成立夜间检查组，每晚进行严格的查宿；同时，学校可以定期开展网络知识和电脑技能方面的比赛，培养学生正确的上网习惯。

第三，社会要做网络游戏环境的净化器。网络游戏成瘾现象已经引起了众多人士的关注和研究，但是目前关于成瘾的干预措施还不成熟，防范举措也不够多元和有效。网吧的经营秩序混乱是网络游戏成瘾的重要原因之一，预防和减少网络游戏成瘾必须从严格规范网吧秩序开始。规范网瘾预防和治疗机构，创新网瘾治疗方法，可以充分运用厌恶法、讲座法与实地观察法相结合的综合

性预防方法。社会上的网瘾预防中心应该定期对青少年主体进行“网瘾危害和预防”的主题讲座，并带他们去治疗中心体验网瘾受害者经受的精神折磨和治疗的痛苦，让他们产生心理抵抗，自觉远离网络游戏。当然，治疗中心必须制订合理有效、以人为本的方法，以高标准、严要求来规范自己的行为。

【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《数字艺术哲学研究》的阶段性成果，项目批准号：09BZX060】

注释：

①马立新：《论数字艺术德性机制》[J]，《理论学刊》，2012年第12期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师范大学传媒学院）

袍秀”，认为代表委员专心履职才是关键，类似的、带有宣传性质的“秀”大可取消或叫停。3月5日，浙江团女代表委员身着正装亮相人民大会堂。“旗袍秀”的设计者和发起人吴海燕公开回应称，旗袍费用完全由其工作室承担，撞车两会纯属巧合而非炒作。3月6日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等人也证实，旗袍都是代表委员自掏腰包，“三八”妇女节，浙江女代表们会穿旗袍亮相。3月8日，妇女节“旗袍秀”再度落空，活动被叫停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随着议题属性显著性被重新设定，公众议程上的属性显著性影响了媒介议程上的属性显著性，网友观点与媒体角度重新达到统一，个体、群体议程与媒介议程在第一层面（传统议程设置）和第二层面（属性议程设置）皆实现融合，并最终影响到政策议程，浙江叫停了“旗袍秀”的相关活动。

### 3. 第三阶段：信息减弱，议题更替

浙江女代表“旗袍秀”活动被全面叫停后，女代表一句委屈的“我们不是政治花瓶”又在短时间内再度吸引了媒体的目光，相关新闻的报道量在3月9日有所回升。3月10日后，事件从个体、社群、媒介及政策议程中淡出。信息减弱意味着公共矛盾的消解，议题更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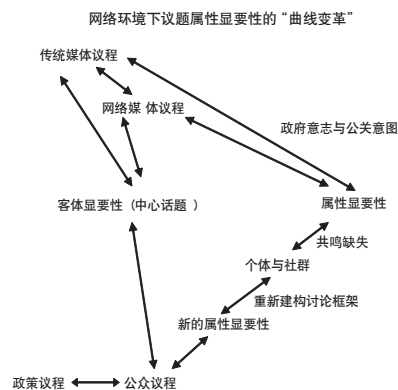
两会开幕前及之初，各类新闻报道及媒介关注焦点往往集中在非中心议题的边缘信息上，如代表穿着、代表名单等，继“旗袍秀”事件逐渐淡出后，代表委员的高档着装和配饰又成为媒体及公众关注的焦点，也成了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。但会议一旦启动，两会的核心信息便向参政议政转移，社会道德建设、食品安全监管等成为更吸引媒体及受众的信息集散区域，议题顺利更替。

网络环境下，个人及社群介入新闻报道，议程设置效果发生作用或作用消失的时间间隔大大缩短，“旗袍秀”事件中，议程设置效果的形成及减弱均仅用了两三天的时间。尽管议题更替了，但在一定时间内，属性议程仍发挥着辐

射作用，具有相同属性的议题能更快地获得关注。“旗袍秀”事件的“时装秀”等属性从浙江代表团迁移至所有代表委员，媒介与公众一齐发现许多代表委员都是名牌加身，高调亮相，两会俨然成了奢侈大牌的又一次风光“秀场”。

## 网络环境下议题属性显著性的“曲线变革”及影响因素分析

在媒介、公众、政策三大议程上，某个议题获得客体显著性并完成属性议程设置后，其属性显著性并不总是保持最初设定的状态，沿最初设定的路线前进，其有可能在议程设置各环节的融合过程中“曲线变革”。议题一旦进入媒介、公众、政策三大议程或其中之一，要么实现顺利转移，要么消亡；而三大议程上对某个客体属性的强调，并非直接转移至另一议程，转移过程中属性显著性可能发生变化。（如下图所示）



网络环境下，议程设置过程中客体显著性的转移，并不意味着属性显著性的必然转移，与客体显著性转移相伴的往往是属性显著性发生“曲线变革”，议题没变，但议程中议题的核心要素发生了变化。具体受如下因素影响：

### 1. 认知因素

网络世界去中心化的特点使公众有了更广泛的表达权和参与权，“沉默的大多数”这一群体规模不断缩小。公众对世界的认知一部分根植于自身的知识结构，另一部分参考意见领袖的独立发言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媒介信息传

达的影响。这些因素综合起来，决定了网络平台上公众对某一事件的看法，以及对这一事件各属性重要性的判断。个体与社群一旦介入某个事件的讨论，便会从各自对事件的认知出发，构建该事件的讨论框架，且与媒介的关注方向形成差异。

### 2. 情感因素

个体是理智与情感的结合体，社群同样如此。因此，在对事件的判断中，情感因素的影响力不容小觑。当下，因政府公信力缺失、财政审计制度不完善等而导致的“仇官”、“仇富”心理不断放大，这成为“旗袍秀”事件属性显著性转变的根源，也是后续对两会代表委员使用奢侈品普遍关注并引发争议的原因。甚至在这一事件中，情感因素的影响比其他因素更大。公众所担心的是“旗袍秀”意味着又一次公款消费，担心相关利益群体搞公关推广，担心两会女代表委员忙于“旗袍秀”而不尽心尽力履行参政议政义务。因此，原有的媒介属性议程进入公众视野后无法引起共鸣，共鸣的缺失又必然地引起影响力的削弱，最终被新的属性议程所替代。

### 3. 公共矛盾与公共辩论

新的属性显著性取代原媒介议程属性显著性，本质上是一个公共矛盾凸显并逐渐消解的过程，公众、媒介、意见领袖等在一个网络平台上充分展开观点博弈，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公共辩论的过程。事件客体中因公共矛盾的存在，导致消极因素被放大，相关利益方成为众矢之的，公众、媒介、意见领袖等在博弈中趋向融合，并达成统一。公共矛盾消解后，议题也顺利更替，被新一轮公共辩论所取代。

### 参考文献：

- ①【美】马克斯韦尔·麦库姆斯著，郭镇之 徐培喜译：《议程设置：大众媒介与舆论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9月第1版
- ②高宪春：《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路径的分析》，《新闻与传播研究》，2011年第1期

（作者单位：广东省清远职业技术学院）